牺牲与救赎:马拉默德笔下的犹太文化母题

徐 慧
(黑龙江科技大学 外语系,哈尔滨 150027)

[摘 要]美国籍犹太作家马拉默德以犹太人及其生活为素材,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犹太民族特征、深刻揭示犹太民族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长短篇小说。《创世纪》、《出埃及记》、《士师记》中的故事情节表明人只有经历苦难、自我牺牲,才能实现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我之死》、《账单》中的小人物甚至用生命来完成一生的救赎。究其原因,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使他们相信负罪——牺牲——救赎是亘古不变的命运程式,然而其救赎的最终结果却是拯救的虚妄。牺牲与救赎这样的犹太文化母题成为马拉默德创作的思想源泉。

[关键词]马拉默德;犹太文化母题;负罪;牺牲;救赎;虚妄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3)02-0199-04

美国是众多优秀小说家的摇篮,其作品彰显了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冲突。特别是二战后,大批美国籍犹太人涌入美国文学的历史舞台,他们把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融合到美国的现实生活中,通过运用犹太文学中的传统母题和主题来揭示西方社会存在的普遍矛盾,探索了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并对艺术风格和手法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使犹太小说的影响超出其民族的范围,成为反映西方文明的佳作。优秀的美国籍犹太作家伯纳特·马拉默德就是以犹太人及其生活为创作原型,创作了具有犹太民族特征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长短篇小说;他描写了犹太移民同化于其他民族,异化于现代社会生活的过程,突出了民族的文化冲突。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犹太人,特别是受尽苦难的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境遇。他的每一部短篇都是高度的故事结晶,故事情节非常紧凑,喜剧与悲剧完美融合,开放式结局发人深思,揭示了犹太文化母题,并凸显了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文化母题在各民族文化历史上有其恒定的结构品质,它贯穿于漫长的文化史程,并以种种特定的方式"呈现在文化的诸形态之中"[1]98。它体现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已形成的文化内涵和模式。犹太文化母题是犹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积淀。几千年来,流浪奔波的生活使犹太人一生都在寻求解决其生计的方法,苦难与折磨成为他们寻求拯救的必经之路,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使他们相信负罪—牺牲—救赎是他们亘古不变的命运程式,然而其最终的结果却是拯救的虚妄。这样的犹太文化母题—牺牲与救赎成为马拉默德创作的思想源泉。他的短篇小说中的"小人物",经历种种磨难和困难(即做出牺牲),追求着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

一、神学中犹太人的"牺牲—救赎"原型

荣格认为,原型是在人类长期的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形象,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通过艺术在无意识中激活转变成为艺术形象[2]。原型批评家一直试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其背后的基本形式—神话原型。在西方文化中,《圣经》主要是记述历史、昭示信仰、指导行为和透露希望,是众多作家创作的思想源泉。同样,马拉默德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圣经》(旧约)中"牺牲—救赎"的原型。

[收稿日期]2012-11-06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252226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慧(1980-),女,山东沂南人,讲师,文学硕士,从事英语语言、英美文学研究。

"牺牲—救赎"的命运程式从人类的始祖开始。《创世纪》中上帝耶和华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让其生活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亚当生活得很孤独，于是耶和华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耶和华规定亚当和夏娃可以食用伊甸园中的任何东西，除了智慧之果。女人永远都是好奇的动物，在蛇的蛊惑之下，夏娃和亚当偷吃了智慧之果，睁开双眼，看到了世界，知道了善恶。神和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耶和华创造了人类，就是人类的父亲，当父亲得知孩子违背承诺，所做的就是惩罚，因此耶和华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并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罚：男人必须通过劳作才能获得生存；女人必须经历痛苦才能获得孩子的生命。由于人类背叛承诺，违反耶和华的圣意，婴孩从出生那一刻就背负着罪恶。背负罪恶与接受惩罚成为人类不变的命运。犹太民族这种负罪—受罚的命运程式在其历史发展中不断深化。当他们颠沛流离、备受迫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耶和华感念儿女的痛苦，指引摩西领导犹太人寻找他们的希望之乡。在寻找新生的路途中，摩西代表犹太人向"天父"立誓，定下约定以表忠诚。立约后，如果犹太人对这位"天父"产生任何怀疑或违背约定中的承诺，都会遭受惨烈的惩罚。《圣经》的《士师记》中记载了犹太人做了耶和华眼中的恶事，背弃了耶和华去拜祭别的神灵，耶和华非常生气，把他们交与四周仇敌的手中，让他们饱经战乱之苦。

基于这种"负罪—受罚"的命运，犹太人用牺牲，即献祭来祈求耶和华的宽恕，寻求救赎。亚当与夏娃的儿子该隐和亚伯就选择了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耶和华的尊敬。他们把自己的出产献给上帝—头生羊和土地的出产；耶和华选择了其所喜爱的——有生命的羊，即后来的"牺牲"；后来亚伯拉罕献子来表示对耶和华的忠诚；"献祭"成为了一种生存模式。犹太人在生活中总是经历负罪与受罚，总是经历痛苦与牺牲，他们希望这种痛苦与牺牲可以让自己不断认识错误，得到耶和华的怜悯和抒发自己内心对这位"天父"的尊重。因此在犹太人众多的节日中，他们通过赎罪祭来批判自己的罪恶和表达对耶和华的尊重。赎罪祭正体现了犹太人背负罪恶后，通过牺牲寻求救赎的思想。在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牺牲"有两种含义，最初指牺牲动物和人为耶和华献祭；在时间的洗礼下，犹太人扩大了"牺牲"的含义，认为"牺牲"是放弃自身的一切甚至生命去做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他们相信"赎罪是人的一种生命实践，既不能停留在观念中，也不能停留在祭祀的'替罪'中"[1]117。"人因流血而得救"正反映了犹太人的心理状态。《以塞亚书》中的"仆人"受难流血为众人赎罪，更好地体现了犹太人为他人寻求救赎而牺牲自我的思想。"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3]。犹太人认为只有通过自我的牺牲才能救赎他人和自己，即人流血牺牲和经历磨难与苦难。他们相信苦难绵延不断，永不休止，它一直指引犹太人选择正确的方向，走正确的道路，摆脱负罪的命运。这正是马拉默德笔下的犹太人的命运。

二、犹太历史中的"牺牲—救赎"

文学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作品中总会体现一定的历史感。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文化和历史是互动的，要把文学重新至于"历史语境"[4]中加以分析和理解，才能更好地了解作家创作的意图。因此，文学与历史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历史的元素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在犹太人的历史长河中，宗教意义上的"牺牲—救赎"贯穿了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民族一直都在牺牲，为他人，为自我；犹太人也赋予这个概念新的含义，这种含义的外延扩大了。犹太民族多灾多难，从他们存在开始，从他们游牧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到寻找希望之乡——迦南，犹太人一直在履行着这样的命运程式—牺牲与救赎。历史记载了犹太人的第一次牺牲是埃及法老命令杀死所有的犹太男孩，以绝后患。在灾荒之年，犹太人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指引下在埃及落脚定居，却被埃及法老奴役，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经历着磨难，履行着自己的命运程式；后来摩西在耶和华的指引下带领犹太人千辛万苦重返迦南。公元前11世纪，他们建立了希伯来王国，却在公元前930年一分为二，彼此之间的冲突成为以色列祖先的第二次牺牲；公元前721年亚述帝国灭了北方的以色列王国，27000多人（包括国王）沦为阶下囚被押往亚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灭了南方的犹太王国，使上万人沦为"巴比伦之囚"，这是犹太人第一次大流散。犹太人的第二次大流散开始于希腊化时期。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犹太人和犹太教受到安条克四世残忍地迫害；到罗马帝国灭了新建的马卡比王朝时，他们屠杀了150多万犹太人，这标志着犹太人开始了第三次大流散。历史长河中犹太人经历着"牺牲"，600多万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政府的迫害，失去生命，成为犹太历史中最残忍的"牺牲"。"牺牲"对犹太人而言只是寻求救赎的方式，寻求耶和华宽恕的方式，他们一直承受着这种命运。在马拉默德的笔下，小人物的生活经历突出了"牺牲——救赎"的文化母题，并赋予其新的思想。犹太人骨子里对几千年的牺牲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认

为“牺牲”就是犹太历史中“祭祀”思想的实践方式。犹太教义表明他们失去生命，遭受迫害，经历磨难就是宗教意义上的献祭。因为在犹太人思想观念中，几千年的历史告诫他们，他们的一生都背负罪恶，需要寻求救赎。“牺牲”的含义由最初的牺牲生命，为了本族人和为外族人牺牲扩展到历史洗礼下的种种灾难。犹太人相信他们是“天父”的“儿女”，耶和华选择了他们，因此他们生来就是受苦的，只有通过经历种种灾难，牺牲自我的一切，甚至生命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救赎他人，获得新生。犹太教对人生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认为犹太人从‘负罪’开始生命，到‘祭祀 - 救赎’经历生命，最后获得新生。这正是犹太人的生命观，它源于犹太教，却超越神学范畴，在犹太人的现实生活中得以丰富，成为犹太作家笔下的犹太历史中普遍性的文化母题之一：牺牲—救赎。

三、负罪：牺牲—救赎—新生的虚妄

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我之死》和《账单》中的小人物最能丰富犹太文化母题—牺牲与救赎。在这两部作品中有四个人物：马库斯、乔西浦、艾米利欧和潘内萨。

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阐释了冲突的内涵：“冲突与隔阂是与他人打交道时和认识自己时的基本特征。”[5]《我之死》这部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小人物熨烫工乔西浦和缝制工艾米利欧就是通过冲突和隔阂来打交道的。他们希望通过彼此的冲突，认识自我存在的理由；对乔西浦和艾米利欧而言，实现自我救赎和重生的方式只能是相互牺牲和折磨。

乔西浦和艾米利欧遭遇相同，性格相似，都是孤独的人。乔西浦的妻子患有肺结核，即使他再想念妻儿，他们都拿不到护照来美国，家书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他总是拿着家书大声诵读，痛哭流涕，用酒精来宣泄自己的苦闷；艾米利欧总是自言自语，轻声叹息，但是从不哭泣，尽管他的妻子总是不在他的身边。他们一动一静，相得益彰，却用不同的方式宣泄心情，也希望通过彼此的折磨寻求新生。他们总是恶言恶语，怒目相对，出手伤人。为了缓解两人的矛盾，店主只能用一块隔墙板把他们隔开。即便如此，两人还是偷偷地透过新门边监视彼此。从被隔开之后，艾米利欧不再自言自语，乔西浦也不再碰啤酒。乔西浦和艾米利欧彼此非常了解，冲突和隔阂只是证明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的个性如此相似，以至于他们从彼此的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的妻儿都不在身边，生活得孤独苦闷。他们痛恨这样的自己，因此不停地发生冲突，折磨对方，折磨自己。当两人彼此看不到对方时又心有不甘。乔西浦和艾米利欧的言行举止，彼此的牺牲、责难和伤害是帮助他们解脱痛苦、摆脱孤独，寻求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在故事的结尾，他们用熨斗和剪刀伤害彼此身体的行为是他们伤害肉体，寻求精神解脱的表征。

马库斯身上所体现的思想是通过牺牲自我来救赎他人。“犹太人从希伯来《圣经》中就在学习公平、慈善、友爱的思想，认为行善就是敬畏上帝”[6]，这位善良的犹太老人——马库斯——一直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感化两个雇员。在老人的深层观念中，他认为行善是尊重上帝，自我牺牲可以救赎他人，因此他对乔西浦和艾米利欧格外宽容。他经常接济乔西浦，关心艾米利欧。即便两人打架误工，老人也从未责备他们。他总是倾听他们的故事，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不要彼此伤害，彼此打架；总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感化他们，让他们放弃冲突。最后一次，为了劝解两人，他摔下了楼梯，死了。他倒下的时候目光呆滞，像是对乔西浦和艾米利欧证明冲突的结果是死亡。马库斯的行为深深震撼了乔西浦和艾米利欧，他们感到后悔，却无法挽回老人的生命。马库斯牺牲生命力求两个雇员可以和平相处。他一辈子遵守犹太教义，相信与人为善是救赎他人的基本方式。他遵守了犹太人特有的命运程式——牺牲自我，救赎他人。

不管是乔西浦和艾米利欧，还是马库斯，他们都在尽力寻求拯救。他们彼此折磨或伤害，或是牺牲生命来寻求解脱和救赎，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明了的：马库斯死了，乔西浦和艾米利欧分别用熨斗和剪刀伤害了对方。这三位人物的身上体现了救赎的虚妄。

《账单》中的主人公潘内萨夫妇与马库斯及其雇员完全不同，他们不断寻求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潘内萨夫妇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自私的丈夫，没有人愿意照顾他们。迫于无奈，他们用自己紧存的最后一笔钱开了一家小卖店，希望能够自食其力。小店对面公寓的看门人威利到小店中购物，和店主夫妇讲述了生活和工作的不容易，虽然只带了五角钱，他却不知不觉地买了三美元的东西。由于威利的太太和潘内萨夫妇很熟识，潘内萨先生同意让威利赊购，并且不要求他及时还上。就这样威利开始赊购各种物品。潘内萨夫妇毕竟并不富有，甚至入不敷出，所以后来不得不向威利要账，哪怕是一点点也可以解决家中很大的生计问题。威利对此十分痛恨，不再去赊购，也不准备还钱。潘内萨先生病了，却身无分文，没钱治病。等威利发现潘内萨太太写来的信，并决定把大衣当了还钱时，潘内萨先生已经躺在棺材里

了。他始终没还上这笔帐。

潘内萨先生是一位老实人，深深受到犹太教义的影响，认为与人为善是对上帝的尊重；认为真正的人会相信他人，真正的人更会讲信用。赊购信用成了潘内萨先生的人生哲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人生理念摆脱作为犹太人负罪的宿命，救赎自我和他人，结果拯救却是一种奢望，无法实现。在犹太人的内心世界里，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而生来就是受苦的，他们在背负罪恶中经历苦难，经历牺牲，希望拯救别人的同时也救赎自我，摆脱苦难和痛苦，实现其精神上的升华。潘内萨先生对别人表示出自己的诚意和信任，希望别人同样会付出，期盼这种精神上的救赎也会提高物质生活，使家里人摆脱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境遇。然而他的这种人生哲理却被威利不齿和利用，最终导致潘内萨死于疾病。潘内萨先生本身是一个负罪—赎罪者，他终其一生来接受“负罪—牺牲——救赎—新生”的命运，结果拯救只是虚妄。因此通过自己的人生哲理摆脱现世的苦难，救赎自我和他人只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潘内萨先生赊购信用的思想使他注定成为一个失败的拯救者。

四、结论

犹太教义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犹太人所经历的挫折和苦难是弥补自己所犯的过错，因此犹太人在不断牺牲和赎罪的过程中，获得肉体和精神的解脱—新生。《创世纪》、《出埃及记》、《士师记》中的故事情节同样表明人只有经历苦难，自我牺牲，才能得到上帝的眷顾，实现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我之死》和《账单》中的小人物们不断经历痛苦，牺牲自我的利益，甚至生命来完成一生的救赎。马拉默德笔下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犹太性，这种“犹太性的中心是忍受痛苦，在痛苦中‘救赎’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犹太法典的规范”[7]，而痛苦即是苦难。《我之死》和《账单》中的小人物都在不约而同地履行了他们特有的命运——努力获救，摆脱负罪，但他们所经历的“负罪——牺牲—赎罪—新生”的过程只是虚妄。这种努力和现实之间总是存有一条壕堑，难以逾越。

[参 考 文 献]

[1] 刘洪一. 走向诗学文化—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8.

[2] 李德荣. 荣格性格哲学[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167.

[3] 中国基督教协会. 圣经(旧约)[M]. 以赛亚书. 52 – 53.

[4] 杜昌忠. 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4.

[5]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470.

[6] 张倩红. 犹太人・犹太精神[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58 – 159.

[7] 乔国强. 论伯纳特・马拉默德的犹太道德观[J]. 东方论坛，1997，(1)：88.

Sacrifice and Salvation: Themes of Jewish Culture in Malamud's Fiction

Xu Hu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27, *China*)

Abstract: Malamud American Jewish author employs Jews and their life to write many short stories reflecting outstanding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Jew and revealing their social life and spiritual world. The plots in *Genesis*, *Exodus* and *Judges* showed man could realize self – salvation and redeemed others through self – sacrifice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Bill*, *The Death of Me*, small potatoes even fulfilled their salvation with their life. The reason lies in Jewish profound religious thoughts, sin – sacrifice – salvation the constant fate formula, while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salvation is fabricated salvation. Such Jewish cultural themes on sacrifice and salvation become the thought origin of Malamud's creation.

Key words: Malamud; Jewish cultural themes; sin; sacrifice; salvation; delusion

〔责任编辑：常延廷〕



牺牲与救赎:马拉默德笔下的犹太文化母题



作者：　徐慧， Xu Hui
作者单位：　黑龙江科技大学外语系,哈尔滨,150027
刊名：　学术交流 PKU CSSCI
英文刊名：　Academic Exchange
年，卷(期)：　2013(2)

参考文献(7条)

1. 刘洪一 走向诗学文化-美国犹太小说研究 2002

2. 李德荣 荣格性格哲学 2003

3. 中国基督教协会 圣经(旧约) 以赛亚书

4. 杜昌忠 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 2004

5.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 1987

6. 张倩红 犹太人@犹太精神 1999

7. 乔国强 论伯纳特@马拉默德的犹太道德观 1997(01)